忻州与“万里茶道”

◇ 张云平

200多年前，山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开辟北方商路，勇闯茫茫戈壁，把生意做到了俄罗斯，成就了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中华贸易史上又一条国际商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时特别指出，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随后，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立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一系列实质性的举措相继跟进，亮点频频，再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一片绿叶，万里飘香。忻州与“万里茶道”有什么关系？忻州是否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重温那段辉煌历史，致敬前辈们的卓越贡献，弘扬晋商的开拓精神，以引发更多人对“万里茶道”的重视、关注、研究和参与。

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

三晋大地，山河壮丽，自古就有“表里山河”之称，整体轮廓山环水绕，与四邻界线十分明显。西部是黄河、吕梁山，东部是太行山，北部是长城，南部有中条山；从纵向来看，两边是大山，中间夹着盆地，大运通道约550公里，东西距离约300公里，地势大致近似一个北高南低的平行四边形。

忻州位于省城太原以北，是山西省内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唯一一个地理上横跨东西的地级市，所以占据山西“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吕梁山”的重要高地。具体说到忻州地理，大体与山西地势一致，也是两边山地，中间盆地，南有石岭关门户，忻州古城因此而被誉为“晋北锁钥”；北有雁门关门户，被誉为“天下第一关”。自古以来，忻州就是中原通

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相互影响孕育了三晋文化，从而也形成了山西人赖以生存又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著名学者王尚义在其《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将明清时期山西的经济区划分为四个版块：大同府经济区、太原府经济区、平阳府经济区（今以临汾为中心县市）和潞泽经济区（今以晋城、长治为中心县市）。

忻州属于大同府经济区，包括了宁武府4县、忻州2县、代州3县、保德州1县，从大的区域看，忻州归晋北，这里紧邻蒙俄，早前经济就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结构。皮毛制品是本地的特产，同时又从南方贩运来茶、棉、丝等手工业制品。中国云南是茶叶最重要的原产地，茶叶有助消化、提气神的药用价值，北方高原上寒冷地区生活的人们“嗜茶为命”，这种产茶区和耗茶区的远距离分离，导致茶叶一度时期被西方人称之为“绿色黄金”。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G·米斯尼科夫研究统计，当时半磅（1磅等于453.6克）中等品质的砖茶就能换到一张貂皮，1磅普通的花茶可换到三至四头奶牛，因此忻州地区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具有边贸特色的市场型经济。

忻州从经济区划分上属于大同府经济区，从军事区划分上战略地位也非常显著。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元朝的蒙古人并没有消亡，而是逃往北方大漠草原，又不断向南侵袭。为了防守北方边疆，明朝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立九边重镇，进驻了70万军队，其中有四镇在地缘上与山西有直接关系，包括大同镇、山西镇、宣府镇、延绥镇。大同镇驻地大同，管辖边墙东至宣府镇，西至偏关鸦头山；山西镇驻地偏关，管辖边墙东至偏关鸦头山，西至老牛湾延绥镇；延绥镇驻地榆林，管辖边墙东至老牛湾，西至宁夏镇边；宣府镇驻地河北宣化，管辖边墙东至居庸关，西至大同平远堡。从中可以看出，忻州几乎全部与四镇有直接关系，而且忻州因为“外三关”与河北“内三关”共同拱卫京师的特殊地位，与九边重镇中另外五镇也有一定的间接关系，都是山西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即便到了清代，关内关外大一统之后，为了防备汉人与蒙古人的联系，军事驻地及力量并没有减弱，只是向北推进罢了，做生意的还是这些山西商人。正是由于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边关战略位置的提升，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军需供应和庞大驻军消费供应的机会，山西商人也因此涉入边镇贸易，催生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由此拉开了晋商纵横商界500年的辉煌史。我们平时所说的“晋商”，就特指明清时期崛起的山西商人。

晋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和缓冲区。晋商走出三晋大地，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占领俄蒙

贸易，开辟北方贸易通道，而茶叶贸易是其大宗商品。山西地理位置的优势，晋商财力的不断积累，加上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万里茶道”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万里茶道”由晋商发起并主导，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出发，途经江西的河口镇，湖南的安化，湖北的羊楼洞、武汉的汉口，河南的社旗镇、孟津渡口，穿越太行山峡谷进入晋城；走进晋中祁县、太谷、榆次休整，北上晋北，经忻州的石岭关、忻州古城、崞阳古城、阳明堡、雁门关北上大同方向。其中忻州石岭关和雁门关是必经的重要关卡，雁门关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分为两路，一路从右玉的杀虎口去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另一路走东路出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从张库大道经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至蒙俄边境的恰克图，然后经圣彼得堡及莫斯科，转往欧州各国。这条道由南向北，先是肩挑，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绵延1.4万公里，途经国内8省区200多个城镇，贯通中、蒙、俄3国，在中华贸易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始建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的崞阳古城城门

开拓的商界领袖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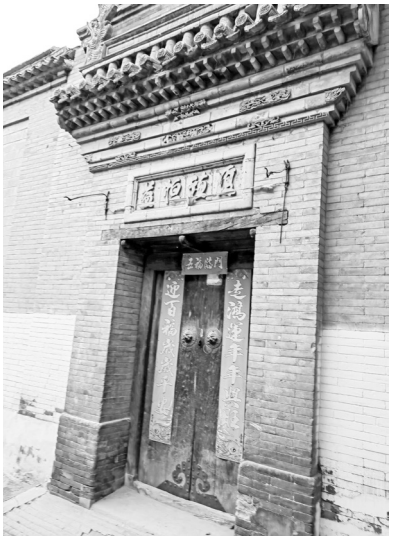
晋商历经千难万险，几度沉浮，称雄商界500年，靠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和政策之便，更在于他们拥有“勤奋节俭、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从最初成功开拓北方商路，后进一步拓展出到京津和江淮地区的南方商路，进而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从前期经营活动主要从事商品贸易，到后期顺应市场规律变革为票号，关键在于，在晋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会涌现出一批开拓的商界领袖人物，力挽狂澜，引领着前进的发展方向。如祁县乔家大院创业发家的始祖乔贵发，榆次常氏家族开通万里茶道的先驱常万达，平遥日昇昌票号的创办者雷履泰，晋商中唯一留有传世著作并才华出众的经理人李宏龄等。

忻商是晋商中的一支生力军，虽没有像太谷曹氏、介休侯氏、祁县乔氏和曹氏、榆次常氏和王氏那样显赫，但忻

商走口外、谋生致富，让一个州县和许多商人发家成为巨富的并不少见。清光绪重修《忻州直隶州志》序文中写道，忻州人“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如周朴斋兄弟两人继承父业，周朴斋到40岁时开始致富，后来“以塞外，非首邱地，复移家于故土，晚年家益丰。忻州屈指巨富者，必及于公”。忻州人中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经理人。闻名商界的山西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办人是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分支机构遍布大半个中国，极盛时从业人员有8000多人，在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代州人王廷相担任过这个商号的总号大掌柜。他从学徒做起，精明能干，一步一步升为大掌柜，使“大盛魁”商号进入黄金期。

在群星璀璨的晋商中，不能不提一位名叫程化鹏（1824—1892）的忻州商人，他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开拓者，也是革新者和推动者。榆次常氏家族后人、民国著名学者、书法家常赞春在其主持编写的《山西献徵》中，专门为两位忻州商人程化鹏和陈吉昌作了小传，称程化鹏为“晋商领袖”，肯定了程化鹏的卓越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统治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总体上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整个中华大地仅有北方的恰克图和南方的



忻州古城东大街上的程化鹏旧居，门头上有砖雕“履谦恒益”四个字

广州两个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恰克图是“万里茶道”上标志性的节点城市，恰克图市场由最初的四顶帐篷，到后来稳定在100多家大商户，可以说晋商几乎垄断了恰克图的俄蒙贸易。

“万里茶道”上的恰克图俄蒙贸易，曾遇到过两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一次是清道光、同治年间，国内民族矛盾加深，白莲教起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将富裕的江南及沿海地区卷入战火，“万里茶道”交通要道几近中断。清政府为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军，实施“厘金制度”，税收加重，晋商“获利无多，是以生计日穷，渐行萧索”。当时，中俄双方在恰克图都已设官管理，中方在朝廷的理藩院设有官司，但不征税，出口和出口税分别由张家口关和归化关（今呼和浩特）征收，凡



代县张垣德华洋行商人驼运货物起程时留念

商人前往恰克图贸易，必须先去上述两关领取理藩院票，又叫“信票”，也叫“部票”或“龙票”，上面注有商人姓名、货物、日期、住宿等事项，沿途道路各个关卡严加盘查，稍有不符或注名不清晰，不是退回两关重办，便是处以罚金或扣留货物，手续繁杂又费时，十分不便。于是一些商人便避开官道，从事对俄走私贸易以营利。但是凡走私者既要承担风险，又要受官吏勒索，同时也使政府减少了税收，其结果是“病商损国”。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忻州商人程化鹏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赴京上书理藩院，陈述政府管理弊端，请求明定税则、简化手续、准许商人运茶直接与俄国人进行贸易，并建议开辟新的贸易商埠伊犁和塔城，以上请求和建议都获得了批准，为山西商人争取到了正当的贸易权利。据《山西贸易志》分析，“咸丰期在恰克图晋商的倍增，当与批准程化鹏的呈请有关”。第二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在华势力日益强大，原本晋商垄断的“万里茶道”，因为清政府允许俄国人直接进入湖北等地建茶厂并享受最惠国待遇降低关税，导致俄国人无须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就可以直接将货物从恰克图运往俄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晋商的生存，程化鹏拼力“回狂澜于既倒”，与另外两位商人余鹏云和孔广仇一起呈请绥远城将军，陈述“俄商到我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也可去俄国而觅新途”，此事经绥远城将军转呈清政府后，引起了恭亲王的重视，最终经同治皇帝御批，准山西商人之请，并予减少厘金税额，以示体恤。晋商又一次在艰难中顽强地站起来，重振旗鼓，返回了恰克图，并陆续深入俄国境内各地，同俄国商人公平竞争商业利源，程化鹏因此而被业界公认为“商界领袖”。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至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西至欧州的这条漫漫的“万里茶道”上，至今仍保留有晋商及沿线商民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诉说着那段曾经荣耀和辉煌的历史。然而，由于时间、战乱等

因素，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因为缺乏挖掘和保护而遭到破坏，正在逐渐遗失。

为此，2020年12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城市联席会议暨‘万里茶道’八省区文物局长申遗工作座谈会”上，通过了申遗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正式成立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文件中将“保护好遗产的景观环境和历史风貌，切实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引起沿线节点城市人们的广泛关注。

说到晋商留给今人的历史文化遗存，最直观、最珍贵的文物遗存当数山西境内的大院建筑和全国各地现存的晋商会馆。一般来说，大院是晋商在外地经商致富后，为显示“富实气象”而在家乡兴建的宅院，像祁县的乔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如今已成为知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会馆则是晋商在向外拓展商道时，为了维护本行本帮的利益而筹建的联络感情、开会议事的场所。历史上山西商人究竟建了多少会馆，目前没有精确记载。清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一书中，记载在京的全省性质及府州县性质的会馆共34个，这些州县是太原、代州、忻州、平定、太平、翼城、闻喜、洪洞、浮山、曲沃、襄陵、临汾、解州、永济、赵城、灵石、介休、汾阳、盂县等，其中全省性质的7个，府性质的4个，州县性质的23个，这些州县，一般都是晋商人才大县，财力雄厚，其中忻州、代州位列其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忻商兴盛的状况。

具体说到忻州在“万里茶道”上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情况，大致可划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官方的资料，包括国史、正史、地方史志中有关忻商茶道方面的记载，以及历史档案中对忻商茶道商贸活动保存的原件资料和实物。二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晋商的研究专著中对忻商茶道方面的研究成果。三是忻商各个时期店铺的账簿、信函、票据、商标、合同、文书等直接文献资料，这些是研究忻商茶道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分资料大都散落在民间收藏者手中。四是文物遗存，包括“万里茶道”经过忻州地界上留下的相关建筑、道路、寺庙、石碑、墓志、器物等，有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蒙俄商家、商路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对于“万里茶道”途经的主干线路都有一致的结论。《行商遗要》是一部知名度和史料性都很高的清代茶商手抄本，详细记录了晋商从湖南安化采办茶砖的全过程，晋商研究学者张亚兰对此手抄本进行了释读与研究。茶帮将茶叶从南方经水路运至河南社旗镇后改走陆路，渡黄河、穿太行山峡谷，进入晋中盆地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休整，北上晋北，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向北延伸

至蒙古及恰克图。其中忻州号称“晋北锁钥”，是晋北的南大门，晋北通道是山西通往京津地区及蒙古、欧洲方面的交通要冲。晋商研究大家张正明在《清代的茶叶商路》考证中，也记录了这条主干线，福建茶叶运至汉口后去往张家口的路线，“转汉口至樊城起岸，贯河南入泽州（今晋城市），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晋商研究学者程光、李绳庆编著的《晋商茶路》中也有一些有关忻州的记载，茶帮“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外，由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也专辟“清代晋商商路”一节，标出了这条从南方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的茶叶商路。

这里补充说明一点，“万里茶道”的主干线是北路，也叫“北商”，就是指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至俄罗斯恰克图这条线路，但历史上茶路系多起点、多阶段特点，相对于恰克图的北路，还有一条西路，即程化鹏上书理藩院要求新开辟并获准的西路，从而催生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约。据清同治朝卷《筹办夷务始末》记载，走西路所办之茶多为安徽建德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往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今呼和浩特），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北路还是西路，“万里茶道”必经忻州地界休整或中转经过，而且不是单纯的过路。当时的忻州古城外南关、北关驿路发达，驿站有马匹、马夫、客栈及仓储的配置，已是一个功能性的重要的晋北商贸城市。

“万里茶道”从太原北上，经石岭关进入忻州地界，依次经过关城村、忻州古城、崞阳古城、阳明堡、雁门关，出雁门入山阴县至大同。

第一站是石岭关内的关城村，位于石岭关东南，出石岭关有古商道通往关城村。城墙现已不存，仅保留有关帝庙戏台，院内石碑六通，重要的有四通，功德



忻州古城南城门楼东北方的关帝庙

芳名碑上有“德义成”“隆兴德”“智天赐”“和合成”“义合成”等商号捐资助建情况，可作为晋商老字号在主要通道存在的证明。尤其是功德芳名碑上记录有时任忻州城加一级守府何圣北、忻州同知方世贤、石岭关巡检司马鳞、崞县原平驿驿丞祝维泰等的捐资助建情况，是“万里茶道”上官方机构介入的实物证据。另据了解，关城村世代有习武风气，当时创立有许多镖局，为沿途运输安全提供服务。

第二站是忻州古城，忻州古城城池为砖石结构，修建于明代，至今保留有南城门瓮城、北城门楼、东门、西门、东段、东南段、西南段城墙，现在活化古城中保留并已将古城城墙四周全部连接完整保存了下来。古城内还保存有部分古建筑：秀容书院、财神庙、关帝庙、泰山庙、兴国寺及少量古民居。关帝庙，供奉财神关公的寺院，院内现有古碑八通，重要的有三通，记载大量商号捐资情况，涉及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市区，可见南来北往商户之众、寺庙香火之兴盛；财神庙最有价值之处在于这里曾设商会、会馆，门楼至今还有“会馆”二字，据说过雁门关的“路引”在这里出具，并且南来北往的商户一定要到这里上香祈求财神保佑，人货安全，财源广进。忻州古城还保存下来一座程化鹏祖居的宅院，该院为清同治年间依太谷宅院样式重新修盖后的砖瓦木结构的四合院，大门保存完好，上有砖雕“履谦恒益”四个字，反映了程化鹏经商的理念和做事的风格。忻商大户郜家、王家、张家、陈家、连家、石家在忻州古城原都有商铺和大院，现大都不复存在，仅有5处在家乡的宅院还部分存在，双堡村郜家堡堡墙较完整，淤泥村赵家钧成堡较为完整，嘉禾村陈家大院有处旧居保存完好，新路村连家连氏堡有堡墙，樊野村王氏二



赵家古堡“钧成堡”堡墙基本保存完好，上有清咸丰三年题记

进宅院基本完好，这些残存的忻商历史遗存亟待保护。

第三站是崞阳古城，崞阳古城为旧县城所在地，1958年迁县治于原平，古城分内城和厢城，现存南门和北门，分别是景明门、宁远门。古城茶路遗存有普济桥、泰山庙、关帝庙、城隍庙、文庙。普济桥始建于金代，位于崞阳镇平定街村南桥河上，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北上商人由此从南门进城，现今石板路上清晰可见有车辆碾压凹陷痕迹的古道。泰山庙现主体建筑为清代所建，存有重要碑刻两通，其中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岱山庙前商寓碑

记》是极为珍贵的实物。

第四站是阳明堡，阳明堡是明清时期北去商人过雁门关的集结地，也是代州重要的商业集镇。现残存东墙50米，南墙60米，北墙10米，墙体属土质夯筑，堡内主大街上还保留少量明清店铺及老宅，如和府、刘缸房老宅等。

第五站是雁门关，雁门关北面出路有东口、西口之分，自始至终“万里茶道”必须经雁门关而过，历史文化遗迹丰富，现雁门关关城楼下石板路上铁轱辘车碾压出的深深车辙印痕以及沿途村庄至今仍残存的多处店铺和货栈遗址，可印证当年雁门关商道的盛况。还有一个重要实证，雁门关南路旁立的一处分道碑，碑文如下：“正堂禁示：雁门关北路紧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由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未便！特示。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吉日立。”这件珍贵文物是晋商在“万里茶道”进行茶叶贸易途经忻州地界的最好佐证。

辗转上万里，壮举照汗青。从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开拓的商界领袖人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三大方面来看，可以说，忻州是“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

回望“万里茶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唤醒历史辉煌的记忆，唤醒忻州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走进新时代勇敢再出发，高度认识“万里茶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历史价值；高度认识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高度认识忻州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的重大意义。充分利用好这块金字招牌，把晋商、忻商、忻州古城和万里茶道串起来，更好地传承和延续晋商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核心精神，再创“万里茶道”新时代“世纪动脉”的辉煌。

敬告著作权人

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有声版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及本刊网络合作媒体龙源期刊网、知网、维普网、博看网进行电子版信息网络传播；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的稿费。

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刊发表的所有作品，由作者文责自负。凡因作品涉及侵犯他人权益者，均由作者承担责任。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修改、删节、编辑加工。另本刊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如由上述原因产生问题，本刊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部分图片来源：百度